



主编 曾繁仁
副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清代卷

刘彦顺 潘黎勇 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济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主编 曾繁仁

副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清代卷

刘彦顺 潘黎勇 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清代卷/曾繁仁主编; 刘彦顺, 潘黎勇等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209-09832-8

I. ①中… II. ①曾… ②刘… ③潘… III. ①美育—思想史—中国—清代 IV. ①G40-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3898 号

责任编辑 孙 姣

助理编辑 张艳艳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清代卷

曾繁仁 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副主编

刘彦顺 潘黎勇 等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70mm×240mm)

印 张 26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09832-8

定 价 10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王夫之的美育思想	8
第一节 王夫之的心性修养论	10
第二节 王夫之的诗教观	32
第三节 王夫之的礼乐教化思想	51
第三章 李渔的美育思想	63
第一节 李渔的艺术教化观	64
第二节 戏曲的教化和娱乐功能	67
第三节 戏曲搬演与艺人的培养	81
第四章 朱彝尊的美育思想	90
第一节 朱彝尊的哲学思想与美育思想之关系	90
第二节 礼乐教化思想与美育的人文关怀	97

第三节 诗论与美育思想	109
第五章 颜元的美育思想	120
第一节 颜元哲学思想及其与美育思想的关系	120
第二节 礼仪教育中的善、美合流	126
第三节 通儒教育与体育思想中的美育	135
第六章 李塉的美育思想	147
第一节 李塉的哲学思想及其与美育思想的关系	148
第二节 礼教与乐教的关系及其重建	151
第三节 全面发展视野中的美育	159
第四节 审美类型的发展与教育	176
第五节 小学课程与审美发展	185
第七章 石涛的美育思想	203
第一节 大道至简，画法归一	205
第二节 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	214
第三节 蒙养之功，生活之操	223
第八章 沈德潜的美育思想	232
第一节 沈德潜对儒家诗教的承继及与美育的关系	232
第二节 “诗教”对个体的美育价值	244
第三节 “诗教”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美育价值	262
第四节 “诗教”与诗歌创作	272

第九章 章学诚的美育思想	283
第一节 “道”论及其实学教育思想	283
第二节 “以象为教”	290
第三节 章学诚论“诗教”	303
第十章 郑板桥的美育思想	317
第一节 元气论美学思想	317
第二节 艺术的社会功能论	321
第三节 郑板桥的人文教育思想	327
第十一章 刘熙载的美育思想	332
第一节 《持志塾言》与刘熙载的修身美育论	333
第二节 《艺概》与刘熙载的文艺美育思想	342
第十二章 康有为的美育思想	362
第一节 美育与德育的关系	362
第二节 道不离器	
——情理兼备的礼乐教化	379
第三节 美育、素质教育与讲学	
——美育实践的具体策略	389
第四节 康有为美育思想的社会价值	399
参考文献	406

第一章 概述

本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是清代的美育思想史。以朝代史为依据，本书所论清代指的是自其立国到辛亥革命（1640—1911）。此外，按照目前较为通行的社会历史分期模式来看，以清代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由此而论，本书所谓“清代”既包括属于中国古代史的“清代”，也包括属于中国近代史的“清代”。自前者而言，本书论述的对象包括王夫之、朱彝尊、沈德潜、颜元、章学诚、李渔、刘熙载、李塨等的美育思想；自后者而言，本书论述的对象包括康有为的美育思想。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王夫之通过丰富的学术著述创构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论域广涉哲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和美学等，且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就包括美育方面的思想论述。概括来说，王夫之的美育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构成他的理学体系核心内容的心性修养思想。在王夫之的心性修养论中，他一方面肯定感性在塑造和谐的个体人格方面不可或缺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道德理性对人性的规范作用，声色与仁义在王夫之的人性论中形成了一种相生相合的张力关系。依照其人性论，王夫之还提出了“习与性成”“性生日成”的教育观念，他反对以本能作为人性的内容，主张从后天变化中去发展具体的人性，这些观念构成其美育思想论述的逻辑起点。第二是王夫之的诗教思想。王夫之的诗教美育论立足于儒家诗教立场，首先强化了关于诗歌情性本质的认识，进而围绕“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等核心观念展开阐述，意在说明诗教的淑世作

用，最终开创出“儒家诗教与审美诗学汇流”的诗教体系。第三是王夫之的礼乐教化思想。众所周知，礼乐教化论乃是儒家美育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以重建儒学正统、中兴圣王之道为己任的王夫之不可能放弃思考礼乐教化之于其所处时代的道德政治意义。如何在王道衰微之世兴发礼乐济世化民的人文价值，探索重构礼乐政制的可能性就成为船山美育思想的重要题旨。总之，王夫之的美育思想既是对两千年儒家美育理论的继承和总结，又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易代之际的社会文化境域赋予古典美育以新的精神特质，因此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

明末清初的李渔可谓中国古代生活美学的宗师巨匠，其所著《闲情偶寄》可说是一部古典生活美学的百科全书。不过，其中最具美学、美育思想价值的还是戏曲理论。李渔高度重视戏曲感化人心、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但同时又将尊重戏曲的审美规律看作是实践教化效用的前提，故在吸收前代特别是元明戏曲美育思想的基础上，从审美的真实性、通俗性等方面深度阐述了戏曲美育的内在机制，将明清的戏曲美育论推向一个高潮。同时，李渔肯定戏曲的娱乐性，认为娱情悦性乃是戏曲本有的艺术功能，故从结构、语言、叙事等角度探讨了强化戏曲娱乐功能的各种途径，这无疑也有助于从美学上深化对于戏曲艺术的认识。李渔是古代戏曲表演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对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有着自觉的认识。从选剧、选角、授曲、教白直到演员的培养，李渔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导演方法论，并从此方面更新了中国古代的戏曲美育思想。

朱彝尊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词人与学者。他在继承与发扬儒家美育思想方面，同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朱彝尊的美育思想受清初哲学思想的影响，尊经风气让他将注意力放在了六经上面，他的美育思想呈现出尊经重道的整体特征。朱彝尊的美育思想资源主要是儒家的美育思想传统，侧重于礼乐教化与诗教方面，又在具体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下有新的阐发。在实施途径上，他特别看重礼乐教化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在思想特征方面，朱彝尊强调一种“合乎人事之宜”的礼乐教化观，尤为重视情感教育，他的礼乐教化观有着一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精神。朱

彝尊的诗教观一方面体现在对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具体的选诗、评诗活动中，形成了以“醇雅说”为核心的诗教观。其诗教观讲究有本有术，“本”强调诗歌的内容要本乎经史，“术”则是强调诗歌的艺术技巧层面，既重视诗施于艺术教育方面的特点，也强调诗对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呈现出极强的美育色彩。

在清代的美育思想史乃至在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中，尤其是在中国儒家美育思想史中，颜李学派美育思想的贡献都是极为独异的。颜元与李塨极为反感宋明理学，认为其尽失周孔之道，其中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只会纸上谈兵，把鲜活的、主客不分离的、生动的、直观的“道”理解为相对主观或者相对客观的独立存在，即“理”，而且，对审美的维度所造成的影响必然体现于——割裂“道”的最直接体现者——“礼”与“乐”“诗”“文”的关系，使得“礼”的存在状态陷于虚无、残缺、停滞，完全丧失了由“乐”“诗”“文”所带来的“礼”的鲜活、生动的兴发性、涌现性与时间性。颜元坚决反对抽象地探究“理”或者“道”的存在，认为其基本的构成枢机是主客不分离的、直观的。这一思想也同样反映在他的人性论之中，其典型的体现就是主张性善论，并由此通往礼乐教化。在颜元看来，宋明理学的缺陷就在于抽象地、玄虚地寻求“理”，把“理”当作一种纯粹知识、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周孔之道”却是仅仅限于道德领域的，比如在孔子看来，道德行为不仅出自于人的善良天性——“仁”，而且“仁”自身呈现为行为是令人愉悦的，能够与“乐”“诗”完全融合，用艺术或者审美来促进“礼”，使之能够兴发并持存，或者说，“礼”自身就是愉悦性的，其与“乐”“诗”的关系从来不是一种不同事物间的“结合”或者“融合”的关系，而是就其自身原发性的呈现状态而言就可以是“乐”与“诗”，而且应该是“乐”与“诗”的。这正是“礼乐教化”的根源所在。

就李塨的哲学思想与美育思想的关系来看，他在理气、理事、知性关系上对颜元思想的坚持与发扬，使得他能够水到渠成地过渡或者延伸到全面发展教育、美育以及礼乐教化诸多领域。李塨的哲学思想与其所

接受的教育是完全融为一体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颜李学派重实行、轻空言的一贯作风。他认为周孔之道在礼乐教化活动上的体现与全面发展教育密不可分，且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有机构成部分。如果礼乐教化活动脱离了“射御书数”，那么，一个社会、国家的运作与管理就会羸弱不堪，从而走向混乱甚至灭亡，这一思想在李塉关于不可片面夸大礼乐教化活动作用的论述中体现得极为鲜明。李塉之所以既强调礼乐教化的兴发性、时机化的重要作用，又把礼乐教化活动的作用与价值置于全面发展教育、社会与国家整体治理的限制之中，就是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一以贯之地强调“气外无理”“气在理先”“事在理中”“知性并进”，这些思想虽然有所差异，但是在根本上又是同出一脉的，那就是认为周孔之“道”的存在方式或者构成状态是鲜活的、应时而动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而非仅仅停留于认知活动、知识活动领域之中的纯意识化的心性修为，即“理”。李塉认为，诸如周孔之原始儒家并没有着重在知识学的维度上用力，而是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道德行为的修行之上，因此，仅仅从其哲学或者思想所使用的语言来看，“道”在频率及其重要性上远远超出了“理”，因为“道”所指的正是在实际生活经验尤其是在鲜活的、兴发性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中体现出的意义或者价值，这些意义与价值尤其以主体间际的道德体验作为典型与核心。虽然原始儒家同时也注重审美生活的质量与意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审美生活与道德生活往往是大幅度地重合在一起的，而且，审美生活或者审美教育要担负起道德养成的任务。而“理”则较多地指向那些在知识领域存在的规律、真理，其所强调的是，“理”能够脱离兴发性的、鲜活的生活经验本身而存在，因此，这就应该是宋明理学所强调的心性之学的根源所在。李塉论及“道”与“理”的区别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在李塉看来，礼乐教化是个人修身、家庭和睦乃至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利器。纯粹自“礼”的呈现来看，其所引发的个体的“敬”的体验，同样是一种愉悦的感受，当然也就同样属于审美体验的一种。进而言之，这种个体的“敬”的体验还会形成社会性的、交互性的主体间性体验，正如李塉所言，“父子”

“长幼”“亲疏”“上下”等等，都是一种社会化的审美体验或者公众化的审美生活。就李塉对“礼”之教化的境界描述来看，的确是符合教育、教化活动最根本的特性的，那就是提高、改变，诸如“序者”“纯者”就是如此，其含义就是随着“礼”的持续教化，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文明，愈来愈有秩序，“仁”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纯粹、澄明。

儒家美育思想在清代的杰出建构还体现在章学诚的思想中。他认为，“道”必须体现为“教”，“教”必须体现为“行”，这既是章学诚哲学与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美育思想得以奠基的枢机，因为他的美育思想并不注重纯粹艺术性的艺术教育，而是强调礼制性的艺术教育，也就是礼乐教化。这既体现在他对“易象”与“诗象”兴发性的重视，又体现在对“诗教”的突出论述上，由“诗”所兴发的“教”及其“道”在存在的状态上更加贴近或者切合人的本性——诸如亲子之爱、愉悦性等等，其在时间上的涌出特性也更为强大，绵延也更为持久。在章学诚看来，“官教合一”“官师合一”或者“政教合一”既是“道”的最为理想与完满的境界，也自然是“教”的最高境界。章学诚一再强调，“道”是一种时机化的存在，不管是常人还是圣人，在其一生中的任何时刻、空间，都会遇到完全不同的时事、挑战，他们都应去不断地学“道”、悟“道”，这意味着“道”是流动的、具体的。虽然在人与人之间，会有禀赋、地位等差别，“道”的教与学却绝不可能采取霸道的方式，而只能是由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来进行悟“道”与体“道”。这种尊重道德教化个体差异的倾向，同时也是极具审美意味的，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说一个人是“圣贤”，其实是就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修为而言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就一个人某一时刻的作为称之为这一时刻的“圣贤”，因为在下一时刻，他是不是“圣贤”就完全无法预料。

沈德潜的美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诗教”观中。沈德潜论诗重“诗教”，推崇诗歌的教化功能。总体而言，沈德潜的“诗教”思想以儒家的“诗教”观为理论来源，是对儒家诗教的继承与发挥。他强调诗歌在个人内在修为及社会政治关怀方面的美育作用，在“诗教”实践方面，

沈德潜通过选评诗集、撰写诗话，倡导“尊唐”和“格调”说，把美育理念融入具体的作品之中，以诗人为榜样、以诗作为典范，为实现“诗教”在个人内在涵养及社会政治关怀方面的美育功能提供了内外兼备的策略和路径。他所倡导的“格调”说既是对“诗教”内容的辅助和补充，亦是美育的一种实践策略的体现。从内在美到外在美，沈德潜全面而翔实的“诗教”实践为诗的美育功能的落实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与此同时，美育的效果反过来也对“诗教”起到助推作用。可以说，沈氏之“诗教”与其美育思想是相互助益、相辅相成的。这正是沈德潜美育思想特点的关键所在。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艺术家，他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而阐述的美学思想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郑板桥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由他亲自编辑的《板桥家书》不仅成为传统儒家道德理念的教育范本，更提出了不少珍贵的、具有历史进步性乃至普世意义的教育主张，比如博爱众生、平等待人、尊重生命等等，这也从根本上塑造了板桥美育思想的人文品格。由于深受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影响，郑板桥非常关注文学艺术的经世致用问题，特别是艺术在人文教化和人格塑造方面的积极作用。

刘熙载的美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持志塾言》和《艺概》两部著作中，分别讨论了其修身论美育思想和文艺美育思想。《持志塾言》记载的大多是治学修身的格言，一则讨论了个体存养省察工夫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则立足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强调将个人的才具品性应用于社会政治的重要性，两种内容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且颇具规模的修养论体系。《艺概》是刘熙载最重要的美学、美育理论著作，它既总论文艺的一般性问题，又分别探讨了多个文艺门类（主要是文字类艺术）各自的美学问题，透露出比较浓厚的理学气息。刘熙载讲求“读书贵有实用”，强调知识和才学的政道价值，他把这种观念应用到文艺批评当中，注重文艺在社会文化建构和个体精神修养方面的根本作用，这成为他文艺美育思想的宗旨所在。刘熙载的文艺观念虽总体上趋于保守，但其建立在对

文艺本质特征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美育思想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值得今人借鉴和继承。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康有为的美育思想极具革新意识和政教特色。由于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康有为的美育思想是在继承传统德行、道艺之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先进教育理念而形成的。其中，强调仁智并重、以礼入教、寓教于乐是对中国传统美育理念的延续和发展，而提倡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注重胎教和职业教育则是对西方近代教育理念的吸收和运用，此为革新意识的体现。作为世纪之交活跃的政治家，康有为将教育与政治紧密相连。他倡导“教通于治”，致力于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和谐、国家繁荣的政治目标和大同理想，此为政教特色的体现。可以说，康有为的美育思想是与时俱进、与民共在的，他真正把美育同个人的完善与提升、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联系在一起，使美育具有了脚踏实地的真实感。为了将美育理念付诸实践，康有为曾撰写多部教育著作，如《教学通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并积极地各地兴办学会，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尽管他的美育理念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原因最终未能获得实际的理想成效，但其丰富而极具实用价值的美育理念依然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宝贵资源。

本卷分工如下：刘彦顺撰写导论、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并对本卷各章内容进行协调与统整，潘黎勇撰写第一章、第二章（部分）、第九章、第十章，杨宝春撰写第六章，崔欣欣撰写第七章、第十一章，余惟杰撰写第三章，张文撰写第二章（部分）。

第二章 王夫之的美育思想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自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等，湖南衡州（今衡阳市）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王船山是宋以后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是明清易代之际思想文化领域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在哲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和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同时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王船山的学术活动与他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他青少年时期亲历明末的政治腐朽和社会动乱，并于二十六岁目睹了朱明王朝的覆亡，这给他带来了刻骨的悲痛，如其后来回忆，“草野哀痛，悲长夜之不复旦也”^①。他前后几次参加抗清斗争，均以失败告终，随后举家流亡，饱尝艰辛。其间有多位亲人去世，父亲临终时命嘱船山兄弟要保持气节，对船山毕生的言思操行产生了深刻影响。四十二岁时，回到故乡衡阳，从此专注于学术研究。他筑“观生居”，题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明自己不计生死，重释六经的宏愿。显然，船山注释六经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纯粹的知识目的，而是带有强烈的政道意图，亦为解决自身的价值困惑。质而言之，即是要在经典中探寻自己所承受的家国剧痛的肇源，揭示儒家道统和礼乐政制存亡绝续的关键，这种价值期望构成了王船山学术活动的根本动力，也是我们在理解他的包括美育理论在内的学术思想时不可忽视的一种精神背景。

王船山以其特别丰富的学术撰述创构了一个博大、深奥的思想世界，

^①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第一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85页。

学界对他思想的解读和定位历来充满争议。梁启超认为王船山是一位富有建设精神的反道学思想家。^①熊十力则在理学系统中定位船山思想,因为后者探讨的仍是理学的基本问题,亦无背离理学的根本宗旨,但有重建中国人之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革新意义。^②侯外庐相信,王船山是一位“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的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家,堪比洛克、康德、亚当·斯密等欧洲启蒙学者。^③侯外庐的观点在新中国的船山学研究史上影响甚大,在相当长时期内几成为认识船山思想特质的不易之论。对照上述诸人,嵇文甫的判断接近于熊十力,但论述更加客观、平实。在他看来,不应简单地把船山思想视为无神论的,或将之提拔到民主主义的高度,船山并没有离开儒家仁政思想的传统,至多代表了开明的地主阶层。从哲学上说,船山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宗师张载、推崇程朱、反对陆王,但船山对程朱之学亦非完全认同,而是有所批判和修正。嵇文甫论道:“假如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程朱是‘正’,陆王是‘反’,清代诸大师是‘合’。……船山在这个‘合’的潮流中,极力反对陆王以扶持道学的正统,但正统派的道学到船山的手里,却另变一副新面貌,带上新时代的色彩了。”^④应该说,无论是修正程朱还是反对陆王,抑或与张载(1020—1077)的承继关系,船山思想从属整个道学(理学)体系当是无疑的。而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大变局时代,船山的目的毋宁是要通过“对明代理学衍变(陆王派和程朱派)的反思和超越,转向笃实的道德实践,以重建儒学的正统”^⑤。

船山一生著述极丰,遍涉经、史、子、集各领域,主要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②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页。

③ 侯外庐:《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页。

④ 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1页。

⑤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页。

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共四百余卷，近千万言。作为一位“坐集千古之智”的思想巨匠，船山的著述中包含了丰富、深刻的美育思想，他在总结两千年儒家美育理论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易代之际的社会文化境域而赋予古典美育以新的精神特质，因此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

第一节 王夫之的心性修养论

王船山对家国剧变的痛思使他把问题的根源归结到道德人心中，他之所以反对王学尤其是左派王学，乃是认定后者鼓吹的无善无恶之说是导致明朝倾覆的精神祸源。因此，重建礼法秩序和政道体制，首要在于补救道德人心，恢复个体和谐的精神生态。作为一名理学家，船山有关道德修养和人文教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心性修养论当中，心性修养论构成了船山美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的是，船山的心性论又与其气本论紧密纠缠在一起，这自然是来自对张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气本论与养气说

船山以气本论为核心的自然哲学历来受到重视，被作为判定船山思想的唯物主义性质的主要依据。船山在理学上宗师张载，奉之为圣学正宗，他的气本论亦是对张载“气”学思想的创造性承述。张载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皆是气聚散离合的表现。试看其相关论述：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①

张载言气，通常与“太虚”并论，他说的“太虚”一般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广大无限的太空空间，又被称为虚空，但太虚或虚空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有气充溢流荡其间，故言太虚，必然有气在其中，而论气，必是指太虚之气；其二，指气混沌未分的本然状态，但气的聚散变化不会损益这种状态，就此意义说，太虚是气的本体，万物皆此本体变易衍生而来。然气又如何化生万物？张载道：“气之本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②无形的太虚之气聚合为有形之物，必须经由“感”这种作用机制。所谓“感”，张载说：“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③“感”是指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力量相互吸引和排斥，由此产生宇宙万物，进而亦可知，任何事物都包含了相互依赖和对立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张载说的“一物两体”。从气上讲，二端或两体便是指阴阳二气。“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④“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⑤阴阳交感，万物所由生，而这个创生、演化的过程和规律就是理学所说的“道”。张载故言：“由气化，有道之名。”又进一步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⑥可见，在张载这里，“气”已然成为心性的本体依据。

张载的“气”学思想几乎被船山全盘接受，并获得更为深广的阐发，这主要体现在《张子正蒙注》一书中。船山说：“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⑦又道：“太虚之为体，

①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8页。

②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页。

③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3页。

④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6页。

⑤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页。

⑥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页。

⑦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第一二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0页。